



# 黄帝“淳化”“虫蛾”成就与 嫫祖“先蚕”“蚕神”名号\*

王子今

**摘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所记载黄帝“淳化”“虫蛾”成就,显示了早期文明进程中丝绸生产的意义。而“嫫祖为黄帝正妃”,“嫫”的文字学分析,所谓“细丝曰系”反映了蚕桑业的发明。黄帝事迹,其中有“嫫祖”的表现。《礼记》关于“先蚕”纪念的礼俗,体现当时对这种产业开创功绩的尊重与崇敬。现在看来,黄帝“淳化”“虫蛾”成就作为帝业基础与文明标志,有嫫祖之功的因素。后世“先蚕”“蚕神”名号,亦体现了黄帝、嫫祖在丝绸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黄帝;嫫祖;虫蛾;丝绸;先蚕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13-08

当前学界关注丝绸之路研究,而丝绸之路史的考察,不能忽略丝绸生产的历史源头。轩辕氏帝业,有“淳化”“虫蛾”成就作为基础之一。《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载:“嫫祖为黄帝正妃。”<sup>[1]10</sup>分析“嫫”的字义,注意“细丝曰系”的解说,可以追溯蚕桑业的早期发明。考察与“嫫祖”相关的传说,有益于对早期生产史中“织作”技术发明认识的深入。历代“后妃”“亲蚕”“劝桑”礼俗制度,体现了对嫫祖的光荣纪念以及对嫫祖事业的继承。这一传统的形成,与黄帝、嫫祖崇拜有密切的关联。

## 一、黄帝传说的“淳化”“虫蛾”情节

黄帝首要的成功表现在于武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sup>[1]3</sup>黄帝又战胜炎帝,“禽杀蚩尤”。然而,除了战功与“治民”成就而外,黄帝在生产发明与经济管理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sup>[1]6</sup>其成就包括农耕生产、矿业开发,以及更为全面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其中“淳化鸟兽虫蛾”,“淳化鸟兽”自然是指家禽家畜的驯化,而“淳化”“虫蛾”应是说对于有益昆虫资源的探索和利用。

《史记》形容人物有“蜂准”“蜂目”的说法,体现了对“蜂”的形貌观察;所谓“蜂起”“蜂午”“蜂出”,则显现对“蜂”的习性观察,都备极具体细微。以“蜂”形容兵锋,也是汉代语言习惯。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可见“蜂卵”入药,又明确有体现使用“蜜”的文字,说明当时人们对“蜜”的食用价值是非常熟悉的<sup>[2]</sup>。

收稿日期:2023-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研究专题”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20@WTC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汉代丝绸之路生态史”(21FZSA005)。

作者简介:王子今,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但我们不知道蜂蜜利用的起始时间,在上古时代的哪个阶段。而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创造者已经开始利用“蚕”这种昆虫的生存特性织造丝绸。考古学者发现了蚕茧的遗存,以“蚕”为表现对象的工艺制作的模型也有实物遗存出土。

《史记》卷二《夏本纪》引《禹贡》关于“沅州”形势的介绍中,说到早期蚕桑生产的繁荣:“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贡漆丝,其筐织文。”<sup>[1]54</sup>裴骃《集解》引孔安国的说法:“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地宜漆林,又宜桑蚕。织文,锦绮之属,盛之筐筐而贡焉。”<sup>[1]55</sup>关于“青州”形势,《禹贡》写道:“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筐鬻丝。”裴骃《集解》引孔安国说:“絺,细葛。”“鬻桑蚕丝中琴瑟弦。”司马贞《索隐》:“《尔雅》云‘屨,山桑’,是蚕食屨之丝也。”<sup>[1]56</sup>也涉及蚕丝生产的经验。《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写道:“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sup>[1]1342</sup>这可以看作《史记》中有关蚕桑业的直接记录。考古发现获得的信息,还要早得多。

## 二、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一:蚕茧

考古发现的桑蚕茧和早期丝织品遗存,对于认识、理解并说明“淳化”“虫蛾”的伟大发明,提供了可靠的文物实证。

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中得到“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发掘者指出“这意义很重大”,虽然未可根据这样“一个孤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但是“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李济写道:“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单说这夏县丝业存在的原故,也值得我们过细地考求一番。”<sup>[3]138</sup>这一发现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肯定了这一发现的价值,“仰韶文化中中期约公元前3800年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有经人工割裂的半个茧壳,可能是食桑叶的野蚕结茧”。研究者认为,这一发现符合蚕丝业技术史的知识。“参考中国民族志材料,在未掌握缫丝抽取茧丝长纤维之前<sup>①</sup>,对茧丝简单

利用方式中,就是要剪开蚕茧,或直接利用其丝絮,或经撕松捻丝打线以供绣花边、织腰带之用。西阴村出土茧壳经人割裂当非偶然所为,可能正反映了先民在早期阶段对桑蚕丝的一种原始利用的方式。”<sup>[4]789</sup>夏县西阴村出土蚕茧透露的技术史信息,体现了蚕丝业的原始性。

田自秉《中国染织史》曾经指出这一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最早的育蚕技术的发明。“一九二六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仰韶遗存中,曾发现有半个人工割裂的茧壳<sup>②</sup>,这说明当时已懂得育蚕。”<sup>[5]5</sup>西阴村的发现“表明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利用蚕茧”<sup>[6]1</sup>。罗瑞林等《中国丝绸史话》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枚蚕茧性质认知的分歧,指出有人怀疑其真实年代,以为“切割的部分”“极其平直”,当时不大可能具备这样的工具。也有人认为这枚蚕茧与现今长江流域桑树上的野蚕桑蠃的茧非常相似。也有学者根据其纹路致密判断,这正是家蚕完全驯化成功之前的原蚕茧,而非桑蠃茧<sup>[7]4-6</sup>。李济已经明确指出:“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sup>[3]138</sup>对于学界种种“质疑”,有学者指出,后续“山西南部涑水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存多项考古发现提供的综合信息,“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sup>③</sup>。

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李济西阴村发现蚕茧的测定,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部分约占全茧的17%<sup>④</sup>。

## 三、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二:蚕茧蚕蛹模型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蚕茧以及蚕蛹的模型也有发现。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2022年发掘出土“距今6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据报告,该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早期石制蚕茧2枚,应是早期蚕桑生产的又一实证。同出石雕蚕蛹6枚,陶制蚕蛹1枚,也是同一性质的发现。据发掘者介绍,2022年度,这里还发现了很多“形态很小的‘石球’,其形制和蚕卵极其相似”。主持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我们分析这些形如蚕卵

的‘石球’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对蚕的生命充满兴趣和崇敬,有意加工制作而成”。考古学者判断,出土地点“很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活聚落,而是一处位于某大型生活聚落旁,专门以养蚕缫丝为主的原始手工业作坊区域”。如此或许可以推知当时蚕桑业的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生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至少以为相关收获“为研究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的认识是可以成立的<sup>⑤</sup>。“经实验室测试鉴定,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定比例的桑科花粉,很可能与先民们养蚕缫丝有关。”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距今6000年以前,黄河中游的先民们崇尚桑蚕,很可能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sup>⑥</sup>

山西闻喜上郭遗址编号为H50的圆形半地穴式房址中,“在①层里出土一枚石雕蚕蛹”,地层判定“属于仰韶晚期偏早阶段,约为距今5200年前后”。然而考古学者推断,“这枚蚕蛹,不排除是更早的西阴文化混入仰韶晚期的”可能。结合“1960年芮城西王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蛹形陶饰’”,研究认为,“以蚕茧、蚕蛹组成的丝织业为突破口”,有益于说明“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sup>⑦</sup>。沿循这样的思路,2019年至2020年河南灵宝川口乡城烟村南发掘的仰韶文化早期东庄类型遗址“发现一枚石雕蚕茧”<sup>⑧</sup>,当然也是重要的发现。

#### 四、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三:丝织品遗存

李仁溥在《中国古代纺织史稿》中写道:“一九五八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经过鉴定,原料是家蚕丝。作为丝的特征是经、纬丝粗细相仿,纤维表面有茸毛状和微粒状结晶体,呈灰白色或白色透明状。成为线的由十多根粗细均匀的单丝紧紧绞捻在一起,保存的织品有尚未炭化而呈黄褐色的绢片和虽已炭化仍保有一定韧性的丝带和丝线。绢片是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四十八根。这些事例证明,我们的祖先约在五千年前,就已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养蚕织绸了。”<sup>[5]5</sup>田自秉《中国染织史》指出,钱山漾出土“一批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有一定水平”<sup>[6]1</sup>。

钱山漾的考古发现<sup>⑨</sup>,是丝绸史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有学者指出,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了“蚕丝蛋白残留物”,“取得了一系列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类残留物的证据,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近4000年”。在河南灵宝川口乡城烟村南仰韶文化东庄类型遗址除“石雕蚕茧”外,还“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河南渑池仰韶遗址2020年8月开始的第四次发掘,考古学者“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sup>⑩</sup>。

我们还看到如下对比较可靠的考古资料所作出的概括性总结:“至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500年的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有炭化蚕桑丝织物,是经缫丝形成的长丝束织造出平纹组织的‘纱’(纨)和绞经组织的‘罗’两种织品,后者还经染成绛色。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遗存,表现出缫、织、染三者具备的丝织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sup>[4]789.[8]</sup>研究者的如下判断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继麻织品应用之后,“考古发现了桑蚕茧和丝织物遗存,可见先民还懂得利用昆虫的吐丝纤维以制成较高级的产品。中国丝织品的出现,是史前纺织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发明”<sup>[4]789</sup>。借助相关信息理解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有关黄帝“淳化”“虫蛾”的记载,可以获得比较真切的历史认识<sup>[9]</sup>。

#### 五、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四:蚕的文物形象

蚕的图像表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发现。1959年江苏吴江梅堰出土黑陶器“有活泼流利的蚕的纹样”。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器上刻有“形态逼真的四条蚕纹”。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早期蚕的模型,有1921年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长约数寸的大理石蚕形饰物”<sup>[7]7</sup>,东北辽宁与内蒙古交界之处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许多玉蚕<sup>⑪</sup>。

河南巩义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牙雕蚕,推定应是野猪牙雕制。此件牙雕蚕的年代,距今已经5000年左右。在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场,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发现丝绸残件。然而在附近的青台、汪沟遗址,却发现了仰韶时代的丝绸遗物。丝绸的保存,有多方面的困难。有

的专家认为,巩义双槐树遗址有可能也存在丝绸,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完全腐坏而踪迹全无。这件蚕形牙雕制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度0.1厘米。以这一件牙雕蚕作为对象,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sup>⑫</sup>。2022年3月,在闻喜上郭遗址又出土了一枚石雕蚕蛹<sup>⑬</sup>。

雕制的蚕的模型,在出土文物中比较常见。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出土玉蚕16件,玉蚕形器1件<sup>⑭</sup>。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蚕19件,此外还有串饰中的仿蚕形部件<sup>⑮</sup>。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作为丰京遗址内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其墓内陪葬大量玉蚕,足以说明西周统治者对种桑养蚕本业的重视。”<sup>[10]</sup>也有学者指出:“岐山、扶风西周奴隶主贵族墓葬中也发现用众多的玉蚕随葬,足见当时对蚕的珍爱和重视。”<sup>[11]</sup>较高等级墓葬出土蚕的文物形象,体现了蚕桑业是受到社会上层密切关注的产业,这首先与富贵者服饰使用丝绸的消费主题相关。

正因为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蚕的文物形式或作装饰,或作标记,或有其他文化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时代美学价值。而文物发现所见蚕的造型,在精神层面又往往是富贵的表现,很可能也是逐富、炫富心理的物化存在。

以蚕形物随葬,后来在较高社会层次中成为风习。春秋时期齐桓公墓西晋时被盗墓者发掘,发现大量随葬“金蚕”。《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垆,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sup>[1]1495</sup>又《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李贤注引陆翊《邺中记》:“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sup>[12]2144</sup>元人杨奂《山陵杂记》:“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垆,一所三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金蚕数十簿,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骨肉狼籍。”<sup>[13]</sup>笔者对于“水银池”有所讨论<sup>⑯</sup>。而所谓“金蚕数十薄”“金蚕数十箔”“金蚕数十簿”,则是与蚕桑业生产与丝绸消费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

汉代相关遗存,有陕西石泉出土的“金蚕”

实物<sup>⑰</sup>。西北大学贾麦明发现的一件汉代“金蚕”,应当是同类随葬物的代表性标本<sup>⑱</sup>。这一现象,或许与汉代嫫祖传说载入典籍有关。关于石泉发现的“金蚕”,有学者指出,鎏金铜蚕“以红铜铸造,然后施以鎏金”,“体态为仰头眠或吐丝状”<sup>[14]</sup>。“仰头”形态,或许与“蚕神”形象所谓“蚕神曰马头”有关<sup>⑲</sup>。民间“马头娘传说”和“蚕马故事”,也可以引为参考。

## 六、“蛾”“蚁”辨正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司马贞《索隐》:“为一句。蛾音牛绮反。一作‘豸’。言淳化广被及之。”张守节《正义》:“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sup>[1]9</sup>

李学勤在关于炎黄文化的论述中涉及“淳化鸟兽虫蛾”。他指出:“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本纪所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蚁),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又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sup>[15]</sup>《史记》“淳化鸟兽虫蛾”,李学勤写作“淳化鸟兽虫蛾(蚁)”,这是有根据的。《楚辞·天问》:“蠹蛾微命,力何固?”王逸注:“言蠹蛾有蠹毒之虫,受天命负力坚固。屈原以喻蛮夷自相毒蠹,固其常也。独当忧秦吴耳。一作蜂蚁。”洪兴祖补注:“蛾,古蚁字。”<sup>[16]</sup>《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关于“蛾”的读音,“蛾音牛绮反”和“蛾音鱼起反”,都接近“蚁”。汉末黄巾暴动,“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蛾贼”就是“蚁贼”。李贤注:“蛾音鱼绮反,即‘蚁’字也。”<sup>[12]2300</sup>

《说文·虫部》中“蛾”字和“螻(蚁)”字前后相邻:“蛾,罗也。从虫,我声。”段玉裁注:“蛾罗见《释虫》。许次于此。当是螻一名蛾。古书说蛾为蠹者多矣。蛾是正字,蚁是或体。许意此蛾是螻。”段玉裁又写道:“《虫部》之蠹是蚕蠹。

二字有别。郭注《尔雅》蛾罗为蚕蠹。非许意也。《尔雅》螳字本或作蛾，盖古因二字双声通用。要之本是一物，非假借也。”许慎说：“从虫，我声。”段玉裁注：“五何切，十七部。今音则鱼绮反。在十六部。”《说文·虫部》又说：“螳，蠹蠹也。从虫，豈声。”段玉裁注：“俗作蚍蜉。非是，今正。《虫部》曰：蠹蠹，大螳也。析言之也。浑言之则凡螳皆曰蠹蠹。《尔雅》：蚍蜉，大螳。小者螳。亦是析言。”<sup>[17]666</sup>如果说“蠹毒之虫”，则“蠹蛾”之“蛾”，自当理解为“蚁”。黄巾军往往并携“老弱”“妇子”，“男女”同行转战<sup>⑨</sup>，所谓“蛾贼”应即“蚁贼”。

看来，确有“螳一名蛾”之说，或说“蛾是正字”，“蚁是或体”。而“蛾”“蟻（蚁）”字形比较，也可以理解文献所见“蛾”即“蚁”的情形。

不过，《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的“蛾”，不可能是“蚁”或“蚍蜉”。既言“淳化”为人所用，只能是“蚕”的生命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蛾”，即“蚕蠹”。“蚕蠹”也就是“蚕蛾”，是蚕出茧之后产籽时的状貌。它在其生命的终点，又生产了延续生命的卵。《说文·虫部》：“蠹，蚕匕飞虫。从虫，我声。”段玉裁注：“匕，各本作化。今正。匕者，变也。蚕吐丝则成蛹于茧中。蛹复化而为蠹。按此蠹与《虫部》之蛾罗主谓蚁者，截然不同。而郭氏释《尔雅》蛾罗为蚕蛾，非许意也。”<sup>[17]674</sup>司马迁在《史记》中基于有关“蚕蛾”的蚕桑业生产知识，将相关历史记忆表述为文字是合理的。

《天问》言“蠹蛾微命，力何固”，注家给予涉及民族政治的解说，王逸“以喻蛮夷自相毒蠹，固其常也”以及“独当忧秦吴耳”的引申，或许并非屈原本意。其实，“蜂”和“蚕”都是与当时社会生活关系最密切，给予人类衣食利益的昆虫。对于“蠹蛾微命，力何固”，也许可以作另外的解释。对于《天问》此说，有的研究者以为难以明确解读。明人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章之义未详，当阙。”<sup>⑩</sup>清人戴震《屈原赋戴氏注》就此不作解说<sup>⑪</sup>。毛奇龄《天问补注》也说：“此章之义未详，当阙。”<sup>⑫</sup>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三说：“以上未详，当时稗官所记，今亡考矣。”<sup>⑬</sup>王闿运《楚词释》卷三说：“谓此有故事，不可强说。”<sup>⑭</sup>他们都不赞同王逸的解释。《文选》卷一三祢衡《鹦鹉赋》：“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李善注：“《楚词》曰：蜂蛾微命，力何固。”<sup>⑮</sup>李善对“《楚

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的理解，与祢衡《鹦鹉赋》“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近义，应当并不赞同王逸的注解。如果不涉及“蠹蛾有蠹毒之虫”之解，则“蠹蛾”即“蜂蛾”，应当就是指“蜂”和“蚕”这样的形体微小、生命短暂，虽“轻鄙”“陋贱”却“力”“固”以奉献人类社会的有益的昆虫。

## 七、“黄帝正妃”“嫫祖”与“嫫”的字义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sup>[1]10</sup>张守节《正义》：“一作嫫。”《五帝本纪》还写道：“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sup>⑯</sup>

就《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嫫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嫫”条写道：“《元和姓纂》曰出自西陵氏女嫫祖，为黄帝妃，后世以嫫为氏。”<sup>[18]47</sup>前引《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言“嫫”“一作嫫”。“嫫祖”即“嫫祖”。《五帝本纪》“嫫祖”，《艺术类聚》卷一五引《汉书》作“累祖”<sup>[19]</sup>。《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纍”条：“《风俗通》曰：嫫祖之后，或为纍氏。谨按《左传》晋七與大夫有纍虎。”卷四“西陵”条又写道：“西陵，古侯国也。黄帝娶西陵女为妃，号曰‘嫫祖’。《元和姓纂》曰：《世本》春秋时有大夫西陵羔。”<sup>[18]66</sup>《集韵》卷一《平声一·东》：“纍，縲，伦迫切。《说文》：缀得理也。一曰大索。一曰不以罪死曰纍。或作縲。文四十五：纍，十黍为累，一曰十丝縲。”<sup>⑰</sup>

嫫、嫫、累、纍、纍、縲、縲，虽字形不同，皆从“系”。《说文·系部》：“系，细丝也。象束丝之形。凡系之属皆从系。读若覩。”段玉裁注：“丝者，蚕所吐也。细者，微也。细丝曰系。系之言蔑也，蔑之言无也。”对于“象束丝之形”，段玉裁解释说：“此谓古文也。”“古文”“小篆”不同“则有增益”<sup>[17]643</sup>。我们看到，“嫫祖”之“嫫”及其他异写形式，都源自“系”的多种变化。“嫫”之字源与“丝”“细丝”有密切的关系<sup>[20]</sup>。

## 八、“嫫祖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与“先蚕”崇拜

在丝绸生产重心地区的民间信仰世界中，曾有不同形式的“蚕神”崇拜。《湖蚕述》卷四《董蠡舟乐府》中《赛神》一篇，说“蚕神”礼拜：“贫家

何以酬神惠,牲醴蠲洁恭报赛。”“孙言昨返自前村,闻村夫子谈蚕神。神为天驷配嫫祖。或祀菀窳寓氏主,九宫仙嫔马鸣王,众说纷纭难悉数。翁云何用知许事,但愿神欢乞神庇。年年收取十二分,神福散来谋一醉。”<sup>[21]</sup>清人吴省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乡试策问》:“蚕神或以为嫫祖,或以为菀窳夫人,或以为寓氏公主……”<sup>②</sup>也说到“蚕神”形象的多样状貌。

有说嫫祖“南朝宋以后被奉祀为‘先蚕’(蚕神)”者<sup>③</sup>。其实,“先蚕”名号出现很早。《续汉书·礼仪志上》:“(仲春之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虽有“蚕神”为“菀窳夫人、寓氏公主”的说法<sup>④</sup>,但早有学者注意到“蚕神”与“嫫祖”的关系。清人冯浩《蚕神说》写道:“神农氏世衰,黄帝轩辕氏代之,蚕事乃兴。黄帝娶西陵女为正妃,是为嫫祖。”“夫蚕肇自轩辕,蚕织妇人之事。意必正妃主之,尊为先蚕实宜。”<sup>[22]</sup>

有丝绸史研究者说:“嫫祖始蚕之说,初见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五》。”<sup>⑤</sup>《路史》卷一〇《后纪一》中《禅通纪·太昊纪上》:“化蚕桑为穗帛。”注曰:“《黄帝内传》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sup>⑥</sup>《绎史》卷五《黄帝纪》有:“《黄帝内传》: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sup>[23]</sup>

如果注意“嫫祖”之“嫫”的字义,就应当承认“嫫祖始蚕”之事的合理性。民国《中部县志》中《黄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注疏)有涉及“嫫祖与蚕桑”的内容。文中写道:“按:〔路史疏仡纪〕命西陵氏劝蚕稼。(未知所本。《黄帝内传》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已见前万项‘与蚩尤战’疏。今俗蚕神率奉嫫祖,于古籍难征矣。然民国十五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新石器遗址,藏有蚕茧半枚,可证发明时代极早。)”<sup>⑦</sup>虽然“今俗蚕神率奉嫫祖,于古籍难征矣”,然而诸多体现“嫫祖始蚕”认识的说法,都应予以重视。《中部县志》执笔者重视西阴村蚕茧的发现,是难能可贵的。

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蚕桑》引王禛《先蚕坛序》曰:“先蚕,犹先酒、先饭,祀其始造者。坛,筑土为祭所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即先蚕也。”又写道:“按: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始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祔而躬桑,乃献茧,称丝织经之功,因之广织,以供郊庙

之服。《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茧,西陵氏养蚕。《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sup>[24]</sup>对于“先”的尊重,体现出古来崇尚发明的科学精神。

## 九、“嫫祖”形象与“后妃”“亲蚕”礼俗制度

与黄帝“淳化”“虫蛾”成就有关,蚕桑业早期发展的功绩应当归于嫫祖。而礼俗制度“后妃”“亲蚕”“劝桑”传统也应当看作相关联的历史文化现象。

西汉人谷永说:“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庙……”<sup>[25]</sup>嫫祖,正是黄帝正妃,即与黄帝“共事天地宗庙”的合作者。《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李贤注:“《礼记》曰:‘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向桑,以劝蚕事。’”<sup>[12]</sup><sup>2059</sup>《续汉书·礼仪志上》有“先蚕”条:“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sup>[12]</sup><sup>3110</sup>《晋书》卷八七《李士业传》记载,“后宫嫔妃”“身劝蚕绩”。《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sup>[26]</sup>《宋书》卷四一《后妃传·孝武文穆王皇后》:“爰诏六宫,亲蚕川室。”<sup>[27]</sup>《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sup>[28]</sup>可见“后妃”“亲蚕”“劝桑”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规事务。

对于上文说到的陕西石泉发现的鎏金铜蚕,有学者以为与“皇后亲蚕”制度有关:“石泉发现的鎏金铜蚕,应是来自高等级的汉墓,它是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是汉王朝农本政策在丧葬礼仪上的重要体现,也是关中和南山(秦岭)蚕桑业兴盛的反映。”<sup>⑧</sup>所谓“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的意见或可商榷。这种“纪念”,不大可能多至“金蚕数十薄”。或说这种“金蚕”“是汉代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御赐品”<sup>[29]</sup>,亦无根据。刘钊《说“金蚕”》列举发现的鎏金铜蚕或“金箔模压的”“金蚕”实物及各种古籍文献记载陵墓随葬“金蚕”凡13例,其中见于正史者有3例<sup>⑨</sup>。可知随葬数量“甚多”或至“以百数”“金蚕”的情形已成影响丧葬礼俗的社会风习,应当与“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或“汉代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御赐品”没有什么关系<sup>[30]</sup>。

有学者说：“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追溯，一般可以认为，‘嫫祖始蚕’并非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间传说，而是统治阶级把文化的创造归功于帝王贵夫人的正统思想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供奉嫫祖的先蚕坛，是历代王朝举行皇后亲桑这一宫廷仪式的场所；遍布各地的先蚕庙，则是各级地方官府举行祭祀的地方，一般蚕农只能敬而远之。因此，现代民间文艺采风中所采集的嫫祖娘娘发明养蚕的故事，也应当是在北周以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附会假托之说。”<sup>⑧</sup>这样的意见似可商榷。固然“现代民间文艺采风”所得故事未必是“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间传说”，但是“嫫祖始蚕”相关故事早已生成。“嫫祖始蚕”传说和“皇后亲蚕”仪礼的关系，恐怕不能说前者因后者而“附会假托”，事实应当是相反的。“皇后亲蚕”表演，是对“嫫祖始蚕”的纪念，也是对“嫫祖始蚕”行为的仿效。从重视生产、尊崇劳动的视角来看，其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 注释

①今按：似应言“在未掌握缫丝抽取茧丝长纤维的技术之前”，或“在未能缫丝抽取茧丝长纤维之前”。②原注：“详见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③⑦参见田建文、王金平：《山西闻喜上郭遗址出土仰韶时期石雕蚕蛹和春秋早期陶范》，《中国文物报》2022年8月12日。④参见布目顺郎：《养蚕の起源と古代絹》，（日本）雄山阁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转引自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⑤参见任爽、杨珏、曲家伟：《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距今6000余年石制蚕茧》，《光明日报》2023年2月27日。⑥⑧⑩⑬参见侯俊杰、王福东：《丝绸起源：从嫫祖养蚕的神话到考古实证》，《中国文物报》2023年4月21日。⑨参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⑪参见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袁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⑫参见李曼、刘彦琪、吴金涛：《一件牙雕蚕的修复保护》，《大众考古》2017年第11期。⑬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⑮王子今：《论秦始皇陵“水银为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⑯张在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9页。⑰贾麦明：《罕见的汉代鎏金铜蚕》，《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4日。⑱参见吴其濬：《植物

名实图考》卷一—《隰草类》“蓝”条，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第113页。⑲《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万余人，輜重二千两，贼皆退却，郡内以安。”《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10页。《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后汉书》第2301页。《后汉书》卷七〇《孔融传》：“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后汉书》第2263页。⑳汪瑗：《楚辞集解》，明万历刻本，第104页。㉑戴震：《屈原赋戴氏注》，清乾隆刻本，第24页。㉒毛奇龄：《天问补注》，《西河合集》清康熙刻本，第9页。㉓王夫之：《楚辞通释》，《船山遗书》清刻本，第38页。㉔王闿运：《楚词释》，清光绪刻本，第22页。㉕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1页；《六臣注文选》卷一三祢衡《鸚鵡赋》：“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李善注：“《楚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论语》子曰：守死善道。《毛诗》曰：欲报之德。《司马迁书》曰：效其痴愚。渝，变也。感恩久不变也。”萧统编，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0页。㉖崔适《史记探源》卷二：“案此文出自《五帝德》、《帝系姓》孔子答宰我之言也。”崔适著，张烈点校：《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㉗丁度：《集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㉘吴省钦：《白华后稿》卷一六《策问辨释》，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第77页。㉙《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47页。㉚《续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补引《汉旧仪》曰：“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后汉书》，第3110页。㉛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袁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㉜罗泌：《路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页。㉝《中部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刻本，第338、376页。㉞张维慎、张红娟：《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业》，《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馆收藏两件鎏金铜蚕，以及20世纪30年代居于青岛的日本人太田氏收藏的两件“金蚕”，出土地点均不详，只能作为考察相关文物的参考。滨田耕作：《金蚕考》，《东亚考古学研究》，日本冈书院1930年版，第221—228页。转引自刘钊：《说“金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3期。㉟即：《南齐书》卷三五《高祖十二王传·宜都王铿》：“时有盗发晋大司马桓温女冢，得金蚕银茧及珪璧等物。”《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31页。《南史》卷四三

《宜都王铿传》：“州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篋为严器，又有金蚕银茧等物甚多。”《南史》卷一六《王子瞻传》：“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0、488页。

⑩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王子今.《史记》说“蜂”与秦汉社会的甜蜜追求[J].月读,2020(12):14-25.
- [3]李济.中国早期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5]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3.
- [6]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7]罗瑞林,刘柏茂.中国丝绸史话[M].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6.
- [8]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J].中原文物,1999(3):12.
- [9]王子今.太史公笔下的“蚕”[J].月读,2020(2):14-25.
- [10]张维慎,张红娟.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业[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90.
- [11]赵承泽.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9.
-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3]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147.
- [14]李域铮.石泉县首次发现汉鎏金蚕[J].文博,1986

(2):93.

- [15]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41.
- [16]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16.
- [1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8]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M].王力平,点校.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 [19]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277.
- [20]王子今.汉代“嫫祖”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影响[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4):68-73.
- [21]汪日楨.湖蚕述[M].北京:中华书局,1956:86.
- [22]王昶.湖海文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8.
- [23]马骥.绎史[M].王利器,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2:35.
- [24]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M].石声汉,校注.石定舫,订补.北京:中华书局,2020:1082.
- [2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25.
- [26]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6.
- [2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89.
- [28]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21.
- [29]汪源,汪建平.“鎏金铜蚕”的几条注释[J].北方蚕业,2018(2):61-62.
- [30]刘钊.说“金蚕”[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3):141-145.

## Huangdi's Success in Cultivating Silkworms and the Leizu's Fame as the Pioneer in Silkworm Breeding

Wang Zijin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Huangdi's cultivating silkworm achievements in "Annals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Volume One of *Shiji* suggest the significance of silk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civilization process. As for "Leizu being Huangdi's queen", the phil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word "Lei" reflects the invention of sericulture. Huangdi's achievements, including Leizu's performance. The rites and customs of commemorating the "Silkworm God" in the *Book of Rites* reflect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the pioneering achievements of this industry in that time. Nowadays, Huangdi's cultivating silkworm achievements, as the foundation of imperial rule and a symbol of civilization, have factors attributed to Leizu's contributions. The title "Silkworm God" in later generations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Huangdi and Leizu in the history of silk.

**Key words:** Huangdi; Leizu; insects and moths; silk; silkworm god

[责任编辑/知 然]